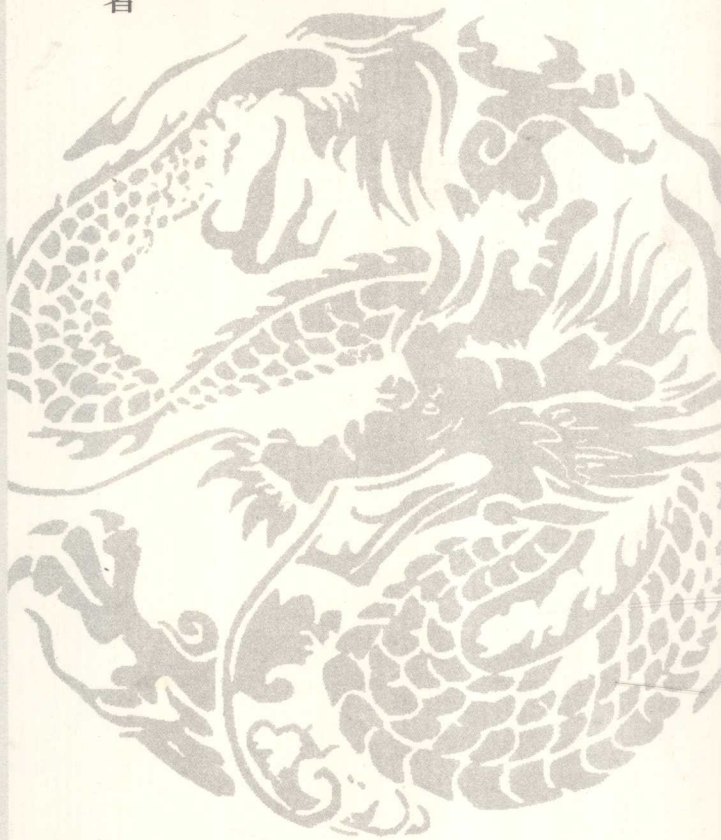


乾隆文治与纪晓岚志怪创作

王颖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乾隆文治与纪晓岚志怪创作

王颖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文治与纪晓岚志怪创作/王颖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8

ISBN 987-7-5348-2955-0

I. 乾… II. 王… III. 笔记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641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7.75

字数:346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版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文言小说自明初《剪灯新话》之后，立意谋篇渐渐向白话小说靠拢，通俗化趋势十分明显，明季文人率多为异人侠客作传，其传文或可视为小说，然与唐传奇精神相去已远。蒲松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是对明代文言小说创作潮流的反拨。鲁迅说《聊斋志异》“复拟传奇文”，《阅微草堂笔记》“追踪晋宋志怪”，他们都要跳过明，乃至宋元，纪昀更要跳过唐代而回归晋宋。有清一代文言小说大体上都循着这两部作品的路向发展，可见它们在小说史上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多年来，学术界关注《聊斋志异》很多，相比之下，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著述就要稀疏一些。就思想艺术而言，《阅微草堂笔记》远远不及《聊斋志异》，但纪昀学识渊博，文思隽永，叙事雍容淡雅，成就又远远高于其他一般作品，而且纪昀是有意反拨《聊斋志异》而作，就更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了。

近些年来海内外研究《阅微草堂笔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不是把所有重要问题都讲透了。例如一些论著常常重复一个观点，说《阅微草堂笔记》批评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是清朝官方哲学，因而这种批评也就具有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味。如果细读作品，就会觉得说它批评程朱理学过于笼统，作品多嘲讽道学家的虚伪，以及道学家的空谈心性，标榜门户，并未径直把矛头指向

“存天理，灭人欲”或三纲五常的基本伦理。这种批评不仅未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扞格，而且正是主流意识的表现。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曾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谥刻，那是一种误解。”鲁迅的看法不符合实际呢？请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所叙魏某读书山寺与一位敬仰他的狐仙对话，魏问狐曰：“汝视我能作圣贤乎？”狐答曰：“圣贤与道学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盛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狐仙的高论，证明鲁迅绝不是主观臆断。

要正确解读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就必须把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放到他生活和成书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假若将这个具体的历史撇开不顾，就作品论作品，固然也可以侃侃而谈，但是谈的是否切中作品的本义，那就难说了。王颖研究《阅微草堂笔记》，把它置于乾隆文治之下，对乾隆皇帝出于君主专制的权谋所制定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周密的研究，考察了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主导下的小说创作环境，还《阅微草堂笔记》以真实的语境。把作品放在这种语境中，并结合纪昀的思想和创作心态进行解读。我以为王颖的思路和方法是正确的，为贯彻这个思想和方法，她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

王颖于2003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读研期间就以优异的成绩显示出较强的学术攻坚能力。不过，对她选择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我仍然有几分担心，因为要在这个题目上做出新意，确非易事。除了要熟读《阅微草堂笔记》以及纪昀的诗文著作外，还要在浩如烟海的清史典籍中搜集有关文化、文学和小说的资料，并对所有这些小说作品以及历史文化状况进行考辨、分析，要在开题报告通过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做好这些工作，其困难的确不小。然而，结果超出我的意想，亦使我惊喜，她把10多万字的论文写出来了，重要的是基本达到了开题报告的预期，获得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好评。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两年前博士论文的修订本。王颖认真吸收了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补充和修改，使其学术质量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这部专著也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些意见也许会有争议，但它富有特色和创见，却是显而易见的。祈望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引发学术界讨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兴趣。

石昌渝

2008年6月29日于北京寓所

引 言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其作者纪晓岚是乾隆时期一位身份特殊、地位特殊的文人。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卒于嘉庆十年，他在朝为官 50 余年，五次掌都察院，三次任礼部尚书，为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兼国子监事，位及一品。在他一生中，曾一次任乡试主考官、三次任会试主考官，门人众多，且朝中满汉大臣几乎都与他关系密切。纪晓岚在乾隆时期的文化建设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他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历 13 年成书。又任英武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胜国诸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等职。他一生经历了乾隆朝始终，朝廷推行的文化举措几乎都有他参与其中，而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翁方纲、陆锡熊、邵晋涵、汪辉祖、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珪、朱筠、姚鼐、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伊秉绶、刘墉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因此，纪晓岚可以称作是乾隆时期的文人代表和官僚代表，他最清楚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了解朝廷推行文化举措的种种意图。乾隆帝自中年以后便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朝野上下因小事而获罪的官僚文士数不胜数。纪晓岚在官场周旋沉浮 50 余年，最终能得以保全自身，以显贵终老，足见他对乾隆时期的生存规则掌握得游刃有

余。在这种时代特征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可以说，他的许多文学观点和学术观点都是当时文化政策的缩影和反映。既然纪晓岚本人是一个能够显示时代特征的典型文人，亦是乾隆朝懂得在规范中立足的官僚的代表，那么，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他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官僚，纪晓岚仕途顺利，一世显贵，除一次遭受小挫折而有过短暂流放的经历外，其余的岁月都可以说是风平浪静。作为作家，纪晓岚有才华有学问，博雅淹通，文笔颇佳，在乾隆朝有“北才子”之称。清代的文人中，官运亨通者大有人在，博学多才的文人也不在少数，二者兼备的人也存在，但除纪晓岚之外，再没有一个这样兼有显贵官僚和风流才子两种身份的文人创作小说。正因为如此，纪晓岚的小说风格必然受到其身份地位的影响，同时这类影响也可能是同时代其他小说中所没有的。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纪晓岚处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最严重的时代——乾隆朝，参与了乾隆朝最重要的文化建设活动——纂修《四库全书》，这种特殊经历又是其他小说作家所不具备的。在清代所有的小说作家中，以纪晓岚的政治地位最高，在文化建设中影响最大，对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了解最为透彻。因此纪晓岚是清代小说作家中经历十分独特的一位，他的特殊性正体现在其身份地位以及经历的与众不同。

纪晓岚晚年创作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渗透着乾隆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取向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研究纪晓岚及其小说的时候，必须将小说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放在乾隆时期整个文化背景下考虑，《阅微草堂笔记》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部文人随意而为、即兴而作的小说，而是一个文人谙熟当朝文化举措并参与了重大文化建设活动之后沉淀而成的作品，也是一个官僚在多年官场沉浮磨砺中积累而成的作品。《阅微草堂笔记》在内涵上反映了纪晓岚对时代的理解与反思，在外延上又表现出他对传统小说的看法，体现了他个人的小说观念，同时这些小说观念又与他在《四库

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的意见遥相呼应。因此，在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也势必要将它放在乾隆朝文化建设和文化专制的大环境中进行。乾隆时期诸多的文化政策在客观上遏制了小说的长足发展，但同时也造就了《阅微草堂笔记》，它的出现与乾隆时代的人文环境息息相关，没有乾隆时代，就不会有《阅微草堂笔记》。将《阅微草堂笔记》放在小说史中，它的文学性可能不及《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小说，可是如果将它放到清代或乾隆时期的文化史或文学史中，它的位置就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要了解乾隆时代和这一时代前后产生的小说作品，首先就要了解《阅微草堂笔记》。

乾隆统治时期时间跨度较长，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时代，这直接导致了当时文人及其小说作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单从研究纪晓岚入手就可以发现，这位一品朝官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中国传统文人常常以“立言”为己任，以纪晓岚的“博雅淹通”，却多次表示一生不著书，然而他却在乾隆末年作《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在学术上推崇汉学，讲求考证和实际，反对空谈和虚幻，但他却在小说中大写鬼狐神妖；他晚年时被称作“世故老人”，可见其在官场中的圆滑之态，但他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用直率敏锐的笔法抨击种种不平；《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等小说均为清代优秀的小说，但《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位潦倒文人，生活状况不佳，遭受贫穷饥寒的困扰，因此很容易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种种弊端产生愤懑的感情，借助鬼狐在虚幻的世界里发泄情绪、控诉不公，而纪晓岚一生富贵，可他的小说中也流露出一股逼人的悲愤之情。这些矛盾都使得纪晓岚和他的小说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纪晓岚在小说中反复强调并提醒读者，《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实录的作品，中国传统观念历来认为“乱世出妖鬼”，乾隆时代60年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这与《阅微草堂笔记》中鬼狐神妖所表现的各种衰败气象格格不入。纪晓岚在

乾隆末年開始创作《阅微草堂笔记》，其意图十分值得研究。至少《阅微草堂笔记》绝对不是一部仅仅为了消遣而创作的志怪小说。

民国以来，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涉及较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阅微草堂笔记》，发表了较为客观公允的意见。他认为《阅微草堂笔记》优点在于“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从文笔风格、思想深度和叙事手法等方面给予《阅微草堂笔记》较高的评价，“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同时也指出了《阅微草堂笔记》的不足之处，认为其风格虽然“尚质黜华，追踪晋宋”，但“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①，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只是借志怪这种形式来发表个人见解，议论过多，有劝善之嫌，这一点对后世的小说造成了不良影响。20世纪60年代两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②，在谈到《阅微草堂笔记》时，均认为此书是《聊斋志异》的模仿之作，在思想内容上极其落后反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在思想内容方面则表现得庸俗、落后以至于反动”^③。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此书“或者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或者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充满腐朽反动的内容”^④。虽然这些评价与当时的政治批评意识有密切关系，但这些观点在几十年来却在大范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② 两部文学史著作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60页。

④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

围内限制了学术界对《阅微草堂笔记》的理解和认识，给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造成了一些障碍。

进入20世纪80年代，《阅微草堂笔记》逐渐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至今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仍旧处于表面化状态。研究的主要视点仍放在《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的比较上。研究重点第一：对于此书的思想内容研究，基本延续五六十年代的学界观点，在褒扬《聊斋志异》的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实，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同时，贬斥《阅微草堂笔记》“基本内容是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的”，“总的主题是‘不乖乎文教’、‘有益于劝惩’，就是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劝善惩恶，以达到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①。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成就远不及《聊斋志异》，其原因是“在于纪氏落后的、包含许多错误的小说观限制了他的文学才能，而这种落后的小说观根源于他的封建礼教思想”^②。即使是有学者认为不应该全盘否定《阅微草堂笔记》，但前提仍然是批判其主体思想意识，认为“以劝惩为指归，自觉地为封建教化服务，确实是这一千余条《阅微草堂笔记》的基本倾向”^③。研究重点第二：对于纪晓岚的文学观念和《阅微草堂笔记》艺术价值的批判。总体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小说创作水平的一种倒退，“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是敌对的，它窒息了纪晓岚的艺术想象力，又因纪晓岚的鼓吹而限制了其时别的若干小说作者才能的发挥”^④，“纪晓岚不懂得小说之为艺术的特点，抱着班固的小说观念不越雷池一步，以蒲松龄近乎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创作为小说的外道，反其道而行之，径以粗陈梗概的六朝笔记的笔法从事创

① 王渭清《〈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语文学习》1981年第1期。

② 王先霭《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的敌对性——纪晓岚小说观评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③ 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④ 王先霭《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的敌对性——纪晓岚小说观评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作，硬让发展了的现实生活穿上古老的艺术衣装，有意创新而终于沦入不类”^①。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界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价有所改变，很多学者认为，在思想内容上，《阅微草堂笔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官场污浊，反映民间疾苦”，同时“抨击浇漓世风，揭穿鬼蜮伎俩”，“抉摘理学流弊，鄙薄宋儒学风”，并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之心，“描写爱情悲剧，哀怜妇女不幸遭遇”^②。另外，“纪晓岚的诸多见解往往是经由结构阅读表达出来的，睿智而充满理趣，常能引发读者的会心一笑”^③。在艺术手法上，赞同鲁迅对纪晓岚创作的评价，称其“文法上严而有格，叙述以简洁古拙见长”^④，“注重智慧，其风格化的表现是幽默”^⑤。在肯定《阅微草堂笔记》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它在叙事上的不足。总体来说，“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艺术成就，多数学者认为其叙事过略，描摹太少，议论过多，成就不及《聊斋志异》。但从小说史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承认《阅微草堂笔记》是笔记小说的集大成者，是笔记小说的顶峰”^⑥。但所有的这些评价还只是一些泛泛而谈，无论是分析小说的思想内容，还是总结小说的艺术特色，都没有指出《阅微草堂笔记》之所以具有其特定风格的根本原因。至今为止，对于《阅微草堂笔记》出现的特定时代的人文背景、影响小说风格的相关文化政策、纪晓岚创作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的成书过程和版本状况等深层次研究还都略显不足。

① 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②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345页。

③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

④ 田同旭、王增斌《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804页。

⑤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⑥ 齐裕焜、王子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目 录

序.....	石昌渝 1
引言	1
第一章 乾隆时期的文治与小说	1
第一节 乾隆时期的基本文治手段	2
一、招揽人才与扶持汉学	3
二、江南征书与思想控制	9
三、树立规范与严惩异端	17
第二节 文治手段对小说的影响	24
一、小说禁令及其本质	24
二、征献书目与小说存留	33
三、乾隆朝的禁毁小说	41
第三节 乾隆后期小说类型的畸形发展	50
一、汉学发达:虚构与考据的矛盾	52
二、辑佚兴盛:整理与模仿的小说	58
三、才子之嫌:传奇体小说的困境	63
四、严禁品评:世说体小说的衰落	69
第四节 乾隆时期文言小说的刊刻传播	74
一、文言小说的出版竞争与刊行状况	74
二、文言小说坊刻不兴的主要原因	80

第二章 纪晓岚的生平遭遇与创作基调	88
第一节 仕途沉浮与创作萌芽	89
一、第一个十年:初入宦途	89
二、遣戍时期:创作萌芽的产生	100
三、第二个十年:总纂《四库全书》	111
第二节 从清朝官制看纪晓岚的官场地位	118
一、高官不高	118
二、有名无实	125
第三节 学者型官僚的小说创作	138
一、创作小说的直接诱因	139
二、官场经历对小说内容风格的影响	147
三、小说对文治政策的迎合	160
第三章 纪晓岚的小说文体观念	174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历代分类标准	174
一、历代官方目录的小说分类	175
二、私家藏书目录的小说分类	185
三、文人专著中的小说分类	194
第二节 纪晓岚对传奇的态度	203
一、“传奇”与小说分类	203
二、“一书兼二体”之辨	213
第三节 《总目》提要与《阅微草堂笔记》的小说观	225
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小说观念辨析	225
二、《阅微草堂笔记》中征引的小说	234
第四章 《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与思想	246
第一节 《阅微草堂笔记》的史家叙事方式	246
一、志怪小说“史”之特征	247
二、《阅微草堂笔记》的补史功能	254
三、《阅微草堂笔记》的“春秋笔法”	261

四、史家叙事方式的借用与因袭	271
第二节 对“乾隆盛世”的否定	280
一、鬼神存世的理论	281
二、天灾人祸的乱世征兆	290
三、杀虐不断的因果报应	303
四、人心士风的岌岌可危	310
余论 《阅微草堂笔记》的刊刻与版本	324
一、分写流传期	324
二、五种合刻期	328
三、选本丛刊期	332
附录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年间纪事(农历)	337
附录二：乾隆时期小说出版状况	407
参考文献	417
后记	425

第一章 乾隆时期的文治与小说

清朝自建国始，统治者就将“文治”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天聪三年，皇太极谕：“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① 清朝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使其特别需要利用汉族文人和汉族文化，以助政权得到天下汉人的认同与支持。“文治”首先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吏，通过得士心来获得民心，以治天下。其次，清朝统治者也想通过“文治”，对天下文人思想进行规范和统一，打击异端思想，巩固统治地位。

清朝“文治”在乾隆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乾隆帝自身对于汉族文化甚是沉醉，一生之中作御制诗 10 万余首，“每一诗成，使儒臣解释，不能即答者，许其归家涉猎，往往有翻阅万卷而不得其解者。帝乃举其出处，以为笑乐”^②。又喜好鉴别书画，酷爱书法。虽然乾隆帝反感旗人沾染汉习，但对于治理天下而言，他坚持以“文治”来控制天下百姓的行为与思想。

乾隆初期，朝廷的各种文治政策基本上沿着康熙时期的轨迹进行，但中期以后，乾隆帝开始建立所谓盛世的“文治武功”，并醉心于其中。一方面，朝廷征战四方，巩固边疆，树立军事上的威

① （清）王先谦《东华续录》“天聪三年”，光绪二十五年公记书庄刻本。

② （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四十八章《乾隆帝及其政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 页。

信；另一方面，进行各种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向天下征书，辑佚《永乐大典》，纂修《四库全书》，修国朝三通，修国史，修八旗通志，刊武英殿聚珍版书，等等。这些文化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清除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与言论，在思想文化方面树立起严格的规范。

在乾隆时期文化活动繁荣的进程中，文学发展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同时也出现了由盛至衰的转折，而小说发展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变化，除了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以外，还受到了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从小说的形态角度来看，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其自身的发展壮大，进而产生变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在社会环境和作者自身原因的双重作用下出现的。因此，乾隆时期统治者文治手段的变化，以及文化环境的氛围必定对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一节 乾隆时期的基本文治手段

乾隆时期针对汉族文人所制定的基本文治手段是招揽和钳制相结合。清朝在建立政权之始，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若招揽汉族文人，实行科举是最佳手段。乾隆时期，统治者在政治上更是极力推行各级科举，“从来为政在乎得人，书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盖贤材登进，在位者多，则分猷效职，庶绩自能就理，而民生无不被其泽也”^①。以科举选拔人才，安邦定国。在选拔人才之时，乾隆帝重汉儒学者，多以这类“安分守己”的文人充当朝廷官吏，则更能满足乾隆帝乾纲独断的欲望。

明清以来，江南各省为国家文化的中心。江南经济发达，文人众多，文化繁盛，思想活跃，清朝初期，朝廷为安抚招揽江南文人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五，商务印书馆，光绪戊申年版。